





# 我在读书生活出版社

## 在上海

我于 1936 年 11 月，经柳湜和徐培影（徐鸿）介绍，到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以下简称“读社”）工作，开始是当练习生。

1936 年，正是我中华民族处在水深火热、生死存亡的关头。日寇铁蹄，已经深入华北，独夫民贼蒋介石，顽固地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调遣大军麇集西北，妄图一举消灭我陕北红军。在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下，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一天比一天高涨，当时的上海，成了国统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前哨。在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章乃器、王造时等为代表的上海文化界、职业界、教育界纷纷成立了救国会，广泛吸收不愿做亡国奴的人士，展开了波澜壮阔的斗争。这被蒋介石视为眼中钉，誓欲扼杀而后快。

在这抗日有罪、媚日有功的白色恐怖中，李公朴先生主持的读社，在地下党员柳湜、艾思奇、黄洛峰等同志的支持下，出版了许多抗日进步书刊，为响应党的号召，作出了显著的贡献。

读社社址设在静安寺路斜桥弄（今吴江路）七十一号，是个三层楼住宅。一楼作为发行部，包括批发、邮购、总务等，二楼作为编辑、出版部。经理的办公室也设在二楼。没有设门市部，只在一楼门厅放了一两个玻璃柜，摆了一些本社出版物，供读者就近购买。

我参加读社工作时，初中刚刚毕业。那时毕业就是失业，连大学毕业生都很难找到工作，像我这样一个穷工人的孩子，能够当一个练习生，已是很幸运了。但那时一般人都把生活、新知、读社等书店，看成是共产党的书店，是戴红帽子的，如被国民党政府抓去，就有杀头的危险。因此，家里的亲人，对我参加读社，颇为犹豫。但是我们信任和尊敬柳湜和徐培影同志，我们仇恨日本鬼子侵略我

国。因此，毅然决定参加。只是大家相戒，这是到共产党的书店里去，不要对别人声张。

我带着简单的行李到了斜桥弄，同志们——同事们已经知道将要增加一个小练习生，见我来到，都热情接待。大家叫我“密斯特赵”（我原名赵子诚），把我引到了一张写字台旁，叫我就在这张写字台上“办公”，简直使我有点受宠若惊。我被分配在邮购部当练习生，在邮购部负责人李自强同志指导下，学习开采购单、开发票、打邮包等。午餐的时候，同志们让我和大家同桌吃饭，晚上则和同志们一样，临时在二楼办公室搭行军床睡觉。大家对我很亲热，根本没有人歧视我，没有“师傅”、“大师兄”欺侮我，也没有让我做一般学徒必须做的洗碗刷锅、倒痰盂等杂务。我在第一个星期六回家将此情景告诉家里，亲人们很高兴：共产党的书店，到底不一样！不久，我写了一篇小文章记下在出版社的日子——愉快的劳动《打邮包》，投寄给《新少年》杂志，居然登了出来，还给稿费——一张购书券，非常开心。

读社的社长是李公朴先生，他一方面是量才图书馆、量才妇女职业补习学校的负责人，一方面还为抗日救亡运动奔走，身兼数职，忙碌异常，还要常到读社来处理社务。一天吃午饭时，我们饭桌上来了一个中年人，身穿长衫，美髯飘然，谈笑风生，愉快地和大家打招呼。他就是李公朴先生。他知道我是新来的练习生，向我点头招呼，我则羞涩得不知如何作答。他是有名的大作家，却和我们同桌吃饭哩。

谁知没过几天，11月23日的清早，我们刚起床，就听到同志们在紧张地谈论沈钧儒、邹韬奋昨晚被捕了，并且都转而担心到公朴先生的安全上来。不一会儿，又传来了确息，公朴先生也于昨晚被捕了！对此突发事件，我们都非常震动和气愤。当时领导上要我们镇静，提高警惕，以防备反动派对读社的破坏。

后来知道，这天晚上一共被捕七人，这就是国民党反动政府为了扼杀抗日救亡运动，逮捕救国会领袖的“七君子”事件。

公朴先生等被捕后，上海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受到国民党政府的打击，不少刊物，都被勒令停刊，读社的《读书生活》杂志也不例外，书刊销售也受到一些阻碍。读社的工作，一时遇到了不少困难，如何把工作坚持下去，成为读社最大的问题。当时领导上决定，由廖庶谦先生暂时代理经理，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间。不久，在郑易里同志筹集银元三千元的资助下，又邀请黄洛峰正式出任经理，大家的心这才踏实下来。这是 1937 年年初的事。

洛峰同志上任后，对读社的工作，日夜操劳，励精图治，做出了不少成绩。一方面，他邀请陈子展先生出面主编《读书》半月刊，出了两期，又被查禁。后来又改出《生活学校》半月刊，替代停刊的《读书生活》，继续供应广大读者精神食粮。另一方面，又增加了一些工作人员，加强了各方面的工作。当时的编辑部，除了艾思奇、柳湜外，还有胡绳、高士其、陈楚云、廖庶谦、曹伯韩、桂涛声等参与其事。出版部门，由周巍峙负责，丁里、徐德纯（徐逸）等参加。发行方面，由万国钧负责，张季良、沈淦三、洪涛等参加。还有李自清、刘麇、李克金，均负过总务工作的责任，卜朝义、张汉清等同志则参与其工作。另外又成立了会计科，改行复式簿记，由袁奇羊负责，何大年任簿记。我的工作，则也由邮购改为出纳，管着保险柜钥匙，经常跑银行。经过这样一系列的部署，没有多久，读社的业务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新气象，出版发行量日益上升，大家的工作精神也很饱满。

那时，我们白天工作是很紧张的，尽管各有分工，但总是互相合作的。社里有一勤杂工，但清洁卫生的事，都是我们大家一齐动手干；发往外地的书籍，都要打成大大小小的邮包，是件很劳累的体力活，我们也都是大家动手，及时捆打、包扎，送往邮局；有时校对忙了，大家也帮助校对，以保证不误印刷厂的付印日期。我们都参加了救国会，所以业余时间，我们也都很忙，除了参加职业界救国会的一些秘密活动外，各人还都有各自的活动。有的参加读书会，有的参加歌咏队、演出队。有名人演讲时，又都去听演讲。

当时，周巍峙就作过多首至今还为人们演唱的曲子。丁里会画画，也会演戏，我们几个小青年，就跟着他们去活动。

读社当时没有设门市部，发行业务主要靠批发和邮购。当时每种书一次的印刷量比起现在来是很小的，每版一般印两千本至五千本。这些书，主要是通过批发往外发行。除了上海的许多书店门市部和我们订有合同，出书时按合同发货外，还和内地各大城市的一些书店订有经销合同。每逢新书新刊出版，我们就全体总动员，把书刊打成大小邮包，尽快发出去，以使全国各地读者能早日买到。和内地各书店商订合同，要做许多艰苦的工作，既要消除对方政治上的疑虑，又要使对方在经济上有所得益，而我们的书刊，也可得以很快地销售出去，加速资金周转。在这方面，主管发行业务的万国钧，经验丰富，方法灵活，立下了不少功劳。

邮购是读社发行图书的一个重要渠道。除了各地读者预定刊物由邮购承办外，各地读者要买各种书刊，也由邮购办理，其销售数量虽不能和批发相比，但供应面分布很广，几乎遍及全国大部分省的城镇，因而政治影响很大。记得当时每天约可收到信件数十封，内附汇票及购书单，有的是几角几元，买一本两本本版书，有的则是数十元、上百元，开列一份很长的购书单。要购的书，有的是本版书，更多的是外版书（即非读社的出版物）。外版书则往往涉及上海各书店出版的任何一种新书或早就出过的书。每逢碰到这样的邮购信，我们总是千方百计到上海各书店各个角落为其采购，甚至要到处寻觅，直至尽到最后努力，给读者寄出。这件工作，卜朝义同志出了好多力气。有的读者，有时还托买其他文具用品等物，我们都尽力代办，不收取手续费。

对邮购的读者，自第一次来函，我们就为他立了卡片，写明姓名、地址、来款若干。如有结余，可以退回，也可根据读者意愿暂存，以备下次购书时连续计算。如收支两清，并无结余，则他的卡片，仍然保留着，并不撤消。这样日积月累，组成了一个非常丰富的读者通讯录。这个通讯录，就成为我们宣传、联系的读者对象。

我们编印的图书目录或其他宣传推广品，按卡片所载姓名、地址，一一寄出，起了很大的宣传作用，也给读者选购书籍提供了方便。这种卡片，以四角号码编成索引，查找起来甚为方便。

当时，邮购的读者，有的是个人，有的是中等学校的图书馆。想到这些个人或单位，他们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冒着很大风险来购买进步书刊，我们总是用最亲切、热诚的心情，为他们服务，使他们满意，从而建立较深的感情。在读者的来信中，有的对我们工作给予了赞扬和鼓励，有的介绍了他们地区，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而看不到抗日进步书刊的苦恼，我们都及时回信作答。当时，有个河南省辉县百泉乡村师范，是我们邮购的老主顾。尽管这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但我至今还记着这个学校的名字。

“七七事变”开始，芦沟桥的炮声，使全国人民抗日热忱从蒋介石长期压制下爆发出来。经过宋庆龄等竭力营救和全国人民的压力，蒋介石不得不把扣押在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的爱国“七君子”释放。这是全国抗日人民的胜利，也是我们生活书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等许多同志无限欢欣的大喜事。1937年7月31日上午，我们读社的几个同志，得知“七君子”即将出狱，并将在中午乘火车到达上海北火车站，连午饭也顾不得吃，立即去车站迎接。我们还是晚到了一步，他们已经下车出站，并已被迎到邓脱摩西餐厅进午餐了。我们又急忙赶到该西餐厅，这时欢迎的人们已经挤满了餐厅。“七君子”神采奕奕，谈笑自若。餐厅里的情绪，非常热烈欢洽。公朴先生风度依旧，忙着和欢迎者交谈。

“八一三”的炮声在上海打响。由于战争的影响，交通受阻，书刊运不出去，影响出版发行业务的进展。这时，生活书店已在汉口设分店，并从上海派去了一部分人员。读社的艾思奇、高士其、周巍峙、李自强等同志，先后秘密地去了延安，胡绳等同志去了汉口。公朴先生出狱后，先是和柳湜到华北去慰问军队，后来也都到了汉口。读社的工作，一直由洛峰同志全面负责。

我们读社怎么办？洛峰先派万国钧去汉口筹设分店，留沪的同

志，因社中事情不多，就让大家积极参加抗日活动。

十月间，上海战事已很紧张，国民党部队放弃上海西撤的迹象已很明显。读社在汉口设社的条件基本准备就绪，就留一部分人在上海坚持工作，由郑易里、刘麇负责。洛峰带着我和徐逸则赴汉口。这时苏州河和长江航运，均已中断，京沪线也已不通，要去汉口，只有坐民船绕黄浦江西行。

我们雇了一只大民船，装满了书籍和一部分纸型，在龙华附近的黄浦江登了船，绕道离开了上海。一叶扁舟，在湖光村色中缓缓而行。除了船老大和二三船工，就我们三人。一路上，洛峰给我们讲了许多事情：国民党的腐败，我党的领导抗日，抗战前途等等，使我和徐逸受到了政治教育。有时他还讲些故事、笑话，讲些他在日本留学时看到的异国风光，也使我们二人增加见识。

如此晓行夜宿，好容易到达镇江。公朴先生的侄子李克金接待了我们，在兵慌马乱的他乡，使我们得到了极大的方便和宽慰。因为我们随带的大批书籍，必须等大轮船运输，我们就在镇江住下来等候。洛峰因不能久等，就搭便船一人先离镇江赴汉口了，把一船“重担”——几乎是读社半个家底，委托给我们两个年轻人。不几日，我们上了大轮船，直赴汉口。

## 在汉口

我和徐逸到汉口时，洛峰、国钧已在汉口为读社找到了社址——交通路会文堂书局的二楼，一间相当大的前楼。这就是读社汉口分社，我们将要战斗、生活的新地方。

这时的武汉，可算是抗战的中心，国民党中央机关，各国使馆都在这里。我党中央长江局和八路军办事处也设在这里。党报新华日报正在这里筹备出版。周恩来同志就在这里肩负着党的重任，在国统区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由于党的领导，这时的汉口，各种抗日群众团体非常活跃，抗日民族先锋队、青年救国团等组织，犹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由于上海的许多书店、出版社迁

到汉口，各种书籍刊物也非常多。生活书店、开明书店、上海杂志公司等门市部生意兴隆，各种书刊往往被一抢而光。

我们从上海带来的一船书籍，正好赶上供应武汉广大读者的急需。后来我们陆续出版了不少书籍，如《晋察冀边区印象记》（周立波作），《给予者》（东平作）等。还接受了党刊《群众》的公开发行人工作。读社在汉口仍没有设门市部，仍是搞批发，把我们忙得不亦乐乎。由于工作的需要，读社这时陆续吸收了好几个新同志，范用、孙家林、郑权（郑树惠）、陆良才（陆家瑞）、刘少卿（刘耀新）、汪锡棣（汪晓光）、欧阳章、刘田坤、程嗣文等，都是这个时候入社的。那时，我们白天在二楼搞批发——开发票，打算盘，打邮包，接待客人，晚上，这间房子又成了宿舍，桌上、地板上都是我们睡觉的地方。

在汉口，读社下力最大的是准备出版《资本论》，我们习惯叫它为“大书”。“大书”是郭大力、王亚南二同志合译的。记得郭大力那时在江西乡下，专事翻译“大书”，他译完一部分，就把稿子寄到汉口来，我则奉命按时给他寄稿费。有时资金周转有困难，但总是先给他寄稿费，把其他开支往后推，可见读社对译者的关怀。当时我们这些小伙子，很希望多编印些抗战小册子，现出现卖，显得活跃，也可以加速资金周转，多得点收入。一部“大书”几百万字，谁知什么时候才能译完，又什么时候才能出版发行。但是洛峰想得深，看得远，毫不动摇，坚持出“大书”的计划。当时，有些出版商，东拼西凑，粗制滥造，印一点“时髦货”，只图赚钱，对读者毫不负责任。这促使我们认识到，搞革命的出版事业，必须具有崇高的理想。读社的出版物，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革命事业。

抗战期间，武汉的纸张、印刷都比较困难，所以“大书”是在上海印刷的。但是“大书”是用新五号字，还是用老五号字排印，直排还是横排，在汉口的洛峰同志和在上海的郑易里同志，函电往来，商议了多次。洛峰同志主张用新五号字，横排，这样可以省纸省成本，从而也可减轻读者负担；易里同志则嫌新五号字小了些，

读者太费眼力，坚持用老五号字横排。后来，“大书”决定还是用新五号字，他们的争论意见一致了，感情也更深了。他们二人这种对出版事业的忠心耿耿，对读者的极端负责的精神，给了我们极其深刻的印象。

我们这些年青人，白天紧张地干着书店的工作，业余时间，则积极地参加各种救亡活动和学习活动。我这时参加了武汉青年救国团，并在这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们的活动是写壁报，写大标语，歌咏，演剧，参加游行等。尤其是歌咏，大家唱得非常多，歌声是成天难得断过。当时，桂涛声同志（我们叫他“阿桂”）住在读社，他每写成一首歌词，如《募寒衣》、《八百壮士》，由冼星海、夏之秋谱成曲，拿回社里先让我们唱给他听。至今还在不断演唱的《在太行山上》，就是阿桂作词，冼星海谱曲，先让我们唱起来的。我们还参加读书会，学习一些社会科学常识，每天工作开始以前先学习《大众哲学》。新知书店的华应申同志组织过一次会计训练班，我和读社几个同志也参加了。虽然是短期的训练，但使我们学得了一些会计、簿记的基本知识，使以后自己在独立工作时对财务处理得益不少。

我们这伙年青人，年龄多数是十几二十岁，初中上下的文化程度。日本鬼子的枪炮，把我们“赶”到一起来了，读社是我们的家，洛峰对我们的成长，负起了他的责任，他当时不到三十岁。在工作时，大家争先恐后，在业余时间，又亲似兄弟。天气冷了，我身上还无棉衣，洛峰就把他的一件棉袍赠给我。夏天到了，洛峰又和我们一起到东湖去游泳。我从没下过水游泳，洛峰一家伙把我按在水里，试试我的胆量。我们平常伙食吃的是包饭，不算好，他就在节日或方便的时候，带我们到饭馆去吃一次西餐或便饭。那时，我们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生活、战斗情况并不很清楚，但是却深深感到，我们是生活在读社这样一个革命大家庭中。

1938年9、10月间，武汉的敌情比较紧张了。国民党早已定重庆为陪都，许多机关不断向重庆转移。生活、新知等兄弟书店已在

重庆开设了分店，读社也派了刘少卿前去筹备，并把大部分纸型运到重庆，以防万一。当日军迫近武汉的时候，有一个问题使洛峰大伤脑筋，这就是我们的总社设在哪里好，广州？重庆？考虑到广州同上海联系方便（这时上海读社一直在出版、翻印书籍以供内地销售），出版印刷条件也比重庆好，因此他最后决定，把总社设在广州。他派我专程去重庆，把运到重庆的纸型取回运广州。洛峰给我打通关系，让我乘国民党中央银行包的一艘客轮前去重庆。谁知未到宜昌，在轮船上得知日寇已在广东大鹏湾登陆，向广州进攻，和日寇围攻武汉，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得此消息，我一个人在轮船上，真是忧心如焚，没了主意，不知如何是好。显然，到广州去设总社，已成为不可能的事，这样，我转运纸型到广州的任务，也就没有意义了。好不容易轮船到了宜昌，要停几天装卸货物。我立即上岸发电报给汉口向洛峰请示。得到洛峰回电：“可迳赴渝去穗作罢。”我又乘上原轮，西上重庆。

我到重庆不久，10月25日，武汉三镇沦陷，洛峰等同志杳无信息，使我万分焦急。一个不幸的消息传到了重庆：新华日报和八路军办事处从武汉向重庆撤退时，包了一艘小火轮，开到沙市一带江面，突遭敌机轰炸、扫射，潘美年、李密林等十六位同志壮烈遇难。听到这个噩耗，真是无限悲痛。

终于，我们等到了洛峰等同志即将乘轮抵渝的消息。轮船到达的那一天，我们几个早早地到了码头，当轮船靠岸见面时，大家的欢乐不言而喻。

## 在重庆

到重庆后，读社正式成立总社，并且把社名定为读书出版社。在汉口时读社共有两个点：汉口、上海。名义上汉口是总社，但工作基本上是两个独立摊子。到了重庆，读社先在桂林设了分社，继而又在贵阳、昆明、香港设了分社，最后又在成都设了分社。这样，总社不但在业务发展中自然形成，而且是为业务发展所必需了。诸

凡各分社的人事调遣、书籍调运、账务核算、资金调拨等，都通过总社这个中枢机构来进行。因此，在重庆虽然没有门市部，但它的工作因面向各地分社，业务更加繁重了，我们又吸收了一批新同志，丁仙宝、王兰芬、吴忠谷、喻樵松等同志，就是这时入社的。总社编辑部设在冉家巷，由楚云、冬垠主持其事，章汉夫、柳湜、胡绳、许涤新、林默涵、石西民等同志为读社编辑出版做了许多工作。为了加强总分社之间的联系，我们编了一个内部刊物《社务通讯》，一共出了三十六期。现在，范用还珍藏着一套（缺少两期），可能是海内孤本了。

读社各方面的工作进展很快，最大的美中不足，就是在重庆仍然没有门市部。后来好不容易在武库街南端十字路口转角，觅得了一个地点适中，门面开阔，楼层高耸的理想房子。我们进行了内部装修，朴素大方，大家十分满意。盼望已久的门市部，指日可以开张了。一天上午，敌机又来肆虐，我们不得不转入防空洞。在防空洞中，但闻敌机呜呜，高射炮咚咚，炸弹声隆隆。一会儿，警报解除了，我们赶忙跑出防空洞，谁知事情是那么不幸，我们那即将开张的第一个门市部，竟命中一弹，中心炸成一个大坑，一片瓦砾，所有的家具设备，被彻底炸坏。我们的气愤，岂是能用文字来形容！但这次不幸，并未使我们泄气。不久，又在武库街附近的鲁祖庙街觅得了一所房子，其地点和门面，虽比原先的略为逊色，但门市部终于开张了。

这时敌机经常来重庆空袭。有一次，还是夜袭，投了好多烧夷弹。在我们一幢仓库兼宿舍（在二楼）的附近，中了几颗烧夷弹。大火四起，很快将延及我们的仓库和宿舍。重庆的房子大都是木结构，一烧就连成片，惟一的办法是拆火巷，而火巷又拆得逼近了我们。我们在匆忙中，只得从楼上将所有的存书和家私行李，统统往大街上扔，然后再往安全地方搬。经过几个小时的紧张抢救，幸好无大损失。这时洛峰同志身体不大好，也和我们这些小伙子一起抢救。后来敌机骚扰越来越频繁，几乎无法工作，我们的财产——书

和纸型，也很不安全。好多单位，都在乡下找了个安全地点办公和存放货物，我们也在江北一个设在道观里的治平小学觅得了几间房子算作后方。这样，我们有时过江进城，有时又在乡下，两头奔走，一清早过江学习，晚上打着火把回到城里办理邮购。

1939年春天，郑易里来到重庆。他原在上海照料读社的工作，后来到了昆明。这次他是从昆明来重庆和洛峰共商读社大计的。易里是和艾思奇合译《新哲学大纲》的译者，在读社最困难的时候，他在经济上多方设法支持了读社。在编辑出版方面，他是主要的负责人。我们大家都很敬重他。他平易近人，说话和气，光从外表看，真不知道他就是有名的翻译家、出版家。易里来到重庆，工作十分忙碌。我们宿舍里没有床铺，大家都睡在地板上，他也就和我们一起睡在地板上，和我们谈笑，聊家常，亲如兄长，而我们本来对他像师长那样尊敬的。

我们在重庆参加的救亡活动，一如汉口时期那样忙碌。这时新华日报和中苏友好协会等单位，经常组织演讲报告会，我们曾先后聆听过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博古等同志的报告。他们都是代表我们党参加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他们作报告时，热情洋溢，感人殊深。我们每听一次报告，都受到一次最好的政治教育。生活书店也曾邀请过周恩来、徐特立同志作报告，我们读社和新知的许多同志都参加了。

追悼新华日报十六位死难烈士，是当时重庆的一次重大政治活动。追悼会十分隆重，党中央、毛主席都送了花圈，在重庆的各党派、各界，都派有代表参加。这对扩大我们党在国民党“陪都”的政治影响，促进统一战线，坚持全国抗战，反对妥协投降，起了很大作用。我们读社、生活、新知和新华日报的一些年轻同志，还集体练唱了专为十六位死难烈士作的挽歌，并在追悼会上担任主唱：“你们英勇的十六个，为了民族的利益而牺牲……”使到会者为之动容。

还有一次是义卖新华日报。义卖那天，我们天不亮就起来，到

党的重庆办事处的某个地点集合。当我们的队伍走到街上时，新华日报的一个同志领着我们高呼“共产党万岁！”我们就跟着连声高呼起来。置身国民党统治区，能够冲破种种禁忌，尽情高呼“共产党万岁”，大家都激动得热血沸腾！我们到新华日报发行部领到了当天供义卖的新华日报，臂上套了“义卖”的红袖章，口呼“义卖！义卖！”一位同志还赶作了一首歌：“义——卖！义——卖！大家都买，新华——日报！”歌很短，大家一唱就会。我们跑遍了重庆市的大街小巷。许多人都主动来买报纸。有时我们也招呼行路人来买。有的住宅大门开着，我们也就进到人家宿舍去义卖。孙家林居然走进了一个“太太”家里，请她买报，这位“太太”十分慷慨，她用一只戒指买了一份报。在这次义卖活动中，除了个别人表现出疑虑的眼光外，绝大多数人都热情支持的。

为了团结出版发行业的职工一致抗日，在直接领导我们的地下党同志的指示下，生活、新知、读书的几个党员同志，以书店职员的名义，发起组成“重庆市书业界同人联谊会”。参加的单位，遍及大小数十家不同政治态度的书店，登记的会员约有二三百人。我和范用、陆量才、吴忠告，生活书店的张国钧、华风夏、何廷福，以及新知书店的徐律等，是这个联谊会的常委。我们的经常活动是开茶话会，以增进相互友谊，在抗日的大前提下团结起来，组织大家参加游行等活动，以激发书业界同仁的政治热情。后来，还在党的领导下，与重庆的妇女慰劳团联合组成“一二·一宣传队”，经常在市区和到郊区磁器口、沙坪坝、南岸等地进行演出活动，深受群众欢迎。

我们积极地活动，惊动了蒋介石的御用书店——专门出版反共书刊的正中书局。我们的联谊会事先没有主动找过他们，他们却找上门来了。一天，他们邀请我们几个常委参加他们的茶话会。经请示上级党组织同意，我们决定去几个人参加，以观其动静，当时我也去了。在会上，他们准备了丰富的茶点，讲了一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府”之类的滥调，然后要求联谊会在他们“一个

领导”下联谊起来。我们的代表则讲了团结起来，抗战到底，书店同人要为抗日救亡作出贡献。最后是余兴，他们的一个男的，唱了一段京剧《苏三起解》，令人难耐；我们几个人则合唱了一首《义勇军进行曲》。范用还到台上唱了一支歌：“国民党和共产党今天已站在一条线上，他们贡献了全部力量，一齐走上了抗日的战场……”就在这个不尴不尬的情况下，结束了“联谊”。以后，他们再也没有找我们——大概他们已经感到“啃不动”而作罢。我们则“我行我素”，依然积极开展各种活动。

武汉失守后，国民党反共活动逐渐露骨了，“共党问题处置办法”、“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反革命秘密指令，疯狂地推行起来。在抗日根据地跟我八路军闹磨擦。在国统区制造了“平江惨案”、“确山惨案”，杀死我八路军、新四军战士和干部。对民主人士，则恐吓威胁，造谣污蔑。对出版事业，搞了个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限制言论自由，扼杀抗日进步书刊的出版。尤其是对生活书店、新知书店的各地分店，勒令停业或查禁封闭。对书店的领导人，则拘捕、关押。我们读社这时虽因分社不多，还未发生上述极端事件，但图书送审，运输邮递等，也同样受到了刁难和阻碍。读社的工作，不得不在困难中进行。

1939年5月，读社在成都开设分社，定在7月1日开幕，派我去担任分社经理。这个决定使我真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领导上对我的信任，惧的是我一个十八岁的孩子，能在成都的恶劣政治环境中独当一面，完成这艰巨的任务吗？

## 在成都

1939年6月上旬，一辆破旧的木炭汽车，经过两整天的颠簸，终于把我带到了成都。成都分社在刘少卿、徐志岑二同志的辛勤筹办下，此时已在祠堂街（现胜利路）七十二号觅得了社址，它是两层楼双开间，还有点气派。楼下当然就是门市部了，楼上就作为办公室、宿舍和仓库。因为工作需要，总社调少卿同志到重庆，把我

调到成都接替他的工作。所以我到成都时，书架等主要大件已经备齐，只要再做一个分社的大招牌和再添些必需的器具，一俟各分社发来的书籍到得差不多，就可开张营业了。

祠堂街是成都的书店街，东头有商务、中华、开明及战时文化出版社等书店，西头有新华日报成都办事处、生活书店，街南有世界书局、儿童书局等，真是鳞次栉比，像个书刊博览会。我们读社分社正好居其中，也是深得地利之便。

我到成都后，年龄小，阅历浅，又是独立工作，再无总社上级直接领导可以依靠，政治环境又很恶劣，其困难可以想见。幸好我的党的组织关系转到了地下党领导的战时文化出版社社长杨道生同志和经理吴与之同志那里。因此在分社开业方面，得到了他俩的很大的帮助，筹建工作还算顺利。在上海、贵阳、桂林、昆明等分社发来的图书纷纷寄到时，分社开张的条件基本齐备了。由于人手不够，我到成都后，又先后吸收了邱显华、皮孝怀、沈德林等几个同志入社。经过一阵紧张的准备，7月1日，成都分社开张了。各地发来的许多外版书，都是成都其他书店所少见的。开张头几天，顾客盈门，有的来贺喜，有的来参观，有的来购书，好不热闹。许多书籍被抢购一空，日销售额也创了各分社的新纪录。

分社没有出版任务，主要是通过门市部零售书籍，本版书也批发给成都各书店代销。当时，四川的出版物非常贫乏，成都尤其稀缺。为使广大读者得到更多的有益读物，成都分社就把主要精力放在多进各地出版的书上，尤其是上海、香港出版的，还有莫斯科出版的中文版书籍。这些书籍，从寄出地点发出，常常要经过几个月的时间，辗转许多地方才能到达成都。待运到我们手中时，邮包封皮常常都已破烂，书籍也都损坏玷污。我们收到这些书，总是奉若至宝，经过一番整理，再投入门市出售。而其中丢失——实际上是被国民党邮检没收的书刊，也就设法统计有多少了。

我们分社有十来个人，年龄大多数比我大几岁。大家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工作、生活虽然艰苦些，但心情很愉快。我们没有用炊

事、勤杂工，所有杂务如扫街、扫地、上门板、运货、伙食，都是大家抢着干。我们出售的书，通常都是成都其他书店难以得到的，从而赢得了成都广大进步读者的信任。

国民党“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魔爪，这时也伸到了成都。经常有谣言，说要抓这个抓那个，还说要抓生活书店和读社的经理。一天，生活书店的经理接到了“蒋委员长成都行辕”约他去一谈的通知。经理不便不去，一到行辕，立即被逮捕，再也没有回来。从此，我们也就提高了警惕，首先是不要被特务机关找到借口，我们把一些重要的有“查禁”嫌疑的书籍，作了转移和隐蔽，我自己也尽量少出头露面。

但是，事情还是发生了。1940年早春的一个凌晨，我们正在睡梦之中，突然有人狠狠地敲门，我们赶快起来开门，只见好多宪兵和便衣，似狼如虎地冲了进来。他们荷枪实弹，有的守住前门，有的守住后门，不让我们走动，其余几个，就在书桌、书架上到处乱翻，说是找禁书。经过一阵子骚扰，他们把一叠叠书籍堆在一起，要我们捆起来，说这些都是禁书，要没收。我们一看，这些书有《大众哲学》《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都是经过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后出版的。我们就指着书的封底上印着的“业经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批准”的字样给他们看，并责问他们：“这怎么是禁书？”尽管他们理屈词穷，但根本不理我们的驳斥，强行把一捆捆书籍席卷而去。费了这么大困难得来的书籍，竟被反动派如此无理没收，大笔财产白白损失了，想到有多少读者想得到这些书籍而得不到时，我们心中是多么愤慨和悲痛。但这次事件，也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训，我们的工作，还是做得不够巧妙和彻底。同志们把“劫后余生”的一些重要书籍，作了转移，暗地里通过各种方式，主要是通过熟悉、可靠的人士发到读者手中。

1940年3月的一个清晨，我们惊悉，隔壁的新华日报成都办事处，头一天晚上被国民党特务查抄了。尤其严重的是，罗世文（中共四川工委书记、川康特委书记、新华日报成都办事处主任）也于